

从民主化到去殖民化： 加拿大的博物馆学理论（1960—2000年）*

From Democratization to Decolonization: Canadian Museological Theory, 1960-2000

珍妮弗·卡特¹ 希拉·霍夫曼² 著 刘浩乐³ 译 尹凯³ 审校

Jennifer Carter¹ Sheila Hoffman² Translated by Liu Haole³ Revised by Yin Kai³

（1. 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蒙特利尔，H3C 3P8；2. 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洛厄尔，MA 01854；

3.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青岛，266237）

(1. 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éal, Montréal, H3C 3P8; 2.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Lowell, Lowell, MA 01854;

3.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Shandong University, Qingdao, 266237)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20世纪下半叶塑造加拿大博物馆学的认识论基础，跨越语言与学科界限，整合了该国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的特征。重点关注在国际上产生共鸣并影响实践的学者理念，以及反过来推动理论发展的具体博物馆实践。20世纪60年代被视为关键转折点，作者分析了促成加拿大博物馆实践富有活力与创新的多重因素，包括跨国网络、兼具思辨能力的学者-从业者-行动主义者、新文化政策、原住民^①行动主义、专业培训项目的兴起及日益专业化。本文呈现了新博物馆学运动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使命——呼吁重新审视博物馆的社会角色，并推动通过数字化、民主化与去中心化方式增强公众参与，以确保藏品与展览的社会文化相关性。同时，通过不断增强的反身性、本土化及合作性实践，回应了关于专业实践与机构去殖民化的政治与道德诉求，彰显了本土传统与国际网络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对加拿大博物馆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加拿大博物馆学 认识论 去殖民化 生态博物馆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s that shaped Canadian museology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ntegrating distinct features of Canadian museolog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across linguistic and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it highlights scholarly ideas that have gained international resonance and influenced museum practices globally, as well as specific museological practices that have subsequently contributed to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The 1960s marked a defining moment

* 本文为迪莉娅·佐尔扎基（Delia Tzortzaki）和斯特凡诺斯·克拉米达斯（Stefanos Keramidas）主编的《博物馆学理论：1960年至2000年的主要思想流派》（*Theory of Museology: Main Schools of Thought 1960-2000*）一书的第十三章（From Democratization to Decolonization: Canadian Museological Theory, 1960-2000）。本文在翻译过程中有删减。

① 文中“原住民”指加拿大《1982年宪法法案》认定的原住民群体，包括第一民族（印第安人）、因纽特人和梅蒂人。



of radic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paper explores how various factors—including transnational networks, reflective scholar-practitioner-activists, new cultural policies, Aboriginal activ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specialized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programs—collective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a dynamic and innovative Canadian museological praxis. Tracing the trajectory from the late 1960s nouvelle muséologie movement’s call to rethink museums’ social role, through efforts to enhance public accessibility via digit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to the political and moral imperative of decolonizing professional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s through reflexive, Indigenous-led, and collaborative approache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both local traditions and international networks on the evolution of Canadian museological theory and practice throughout this period.

Key Words: Canadian museology; epistemology; decolonization; ecomuseums

1971年，富有远见的加拿大博物馆学家邓肯·弗格森·卡梅隆（Duncan Ferguson Cameron, 1930—2006）撰写了一篇在博物馆学界引起广泛反响的文章。他的宣言式文章《博物馆：神庙还是论坛》^①从根本上挑战了他所感知到的当代博物馆的停滞状态。神庙式博物馆未能“解决其角色定位问题”，尤其是许多博物馆仍在迎合社会和学术精英，以及这些少数精英群体所秉持的价值体系。博物馆界确实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创建或重新构想的众多创新性博物馆中。这些博物馆试图通过各种方法推翻博物馆学传统。比如华盛顿特区的安纳考斯蒂亚邻里博物馆让社区成员参与其自身遗产的阐释，多伦多安大略科学中心采用实验性方法而非既定方法，安大略美术馆采用实验性方法而非传统规范^[1]。

卡梅隆的文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的论

点与新博物馆学运动^②之后致力于重新构想博物馆机构社会可能性的学者产生了强烈共鸣。他们深知博物馆在丰富社区生活、促进身份认同、助力文化发展和保存地方遗产方面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卡梅隆关于彰显博物馆文化与社会责任的呼吁，时至今日依旧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今，另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加拿大博物馆学者罗伯特·简斯（Robert R. Janes）强烈呼吁，博物馆应当针对各种地方和全球问题采取社会行动。事实上，正如简斯的宣言所示，千禧年之际，许多加拿大博物馆不仅重新定义自身，而且采取大量措施推动藏品和实践的民主化，这显示了博物馆参与当代社会事务的潜在角色发生了转变。

1972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博物馆协会在智利圣地亚哥联合举办了一次“博物馆在当代

① 这篇文章改编自卡梅隆1971年受邀在科罗拉多大学博物馆进行的演讲。

② 由于不同的起源、参照点和语境，英语“new museology”和法语“nouvelle muséologie”两个术语的使用在博物馆学领域（以及在双语的加拿大）引起了一些混淆。这种混淆因学者之间的语言分歧而加剧，并且这些术语继续被不加区分地用于指代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发展的博物馆学理论知识平台。在此，我们旨在通过厘清两种不同语境下的使用来区分这一概念。一种指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际运动，其倡导者强调了博物馆的社会目的，例如梅兰德（Mayrand）、约翰·金纳德（John Kinard）、卡梅隆、莫尔（Maure）。另一种理念来自彼得·弗格（Peter Vergo）1989年出版的同名论文集《新博物馆学》赋予的特定内涵。论文集的作者关注的问题与安德烈·德瓦雷（André Desvallées）在1980年称为“新博物馆学”（la nouvelle muséologie）运动所关注的议题不同，他们关注表征与展示的政治。在引言中，弗格奇怪地在自己对该术语的英语化使用之前没有提及“la nouvelle muséologie”。巴特勒（Butler）最近将弗格的著作归入了后来的批判博物馆学运动。参见BUTLER S R. Reflexive museology: lost and found[M]//WITCOMB A, MESSAGE K.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s of museum studies: museum theory. Chichester: John Wiley and Sons. 2015: 159。

世界的发展和作用圆桌会议”^①，这场会议成为了新博物馆学的参考点。绝非巧合的是，会议的目的在于重新审视博物馆在当代世界及其不断演变的需求中所扮演的角色^②。“整合博物馆”^③的概念就诞生于这次开创性的会议，它具有多学科构成和整体性的方法，并在实验性的生态博物馆中得以体现。在加拿大（更具体说是在魁北克），最著名的一位人物是里维埃的一个学生皮埃尔·梅兰德（Pierre Mayrand, 1934—2011）。他不但以参与式博物馆学实践闻名，还作为1984年成立的“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而为人熟知^④。

卡梅隆这篇富有远见的文章以及它在新博物馆学运动鼎盛时期提出的对博物馆作为社会机构的角色进行根本性反思和理论化主张，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塑造加拿大（以及全球）博物馆学理论和实践的两个重要节点之一。另一个节点是定居者去殖民化的持续进程，以及通过日益发展的反身性、本土化和合作性的博物馆学实践对加拿大殖民博物馆学的瓦解。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加拿大博物馆的去殖民化进程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原住民行动主义、对原住民人类遗骸和神圣藏品进行文化返还的呼吁、批判既有实践的艺术和策展干预，以及原住民策展的兴起，多年来成功地挑战了加拿大博物馆和当地居民社区中心内的机构权力关系。

作为一个多学科研究领域，博物馆学存在许多分支，想要梳理其线性历史既不可能也不可取。

在思考20世纪末加拿大的博物馆学理论时，我们聚焦于一些相互交织的理念，这些理念影响了一种日益发展的批判性实践；反过来，我们也聚焦于一些影响了当代博物馆学理论的实践。博物馆机构本身极具复杂性，正如安东尼·谢尔顿（Anthony Shelton）提醒我们的那样，将博物馆作为“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网络化场域中的枢纽”来分析至关重要。对它的研究不仅需要从藏品、展览、观众、管理、文化政策、伦理等方面进行多学科分析，还需要解释包括艺术、历史、科学、自然史在内的不同博物馆类型的独特历史和实践方法^⑤。

考虑到这些注意事项，本文试图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跨越语言和学科鸿沟的几种理论线索汇集在一起，并着眼于21世纪。我们既突出了在国际上引起共鸣并影响了全球博物馆实践和博物馆学理论的杰出学者的理念，也指出了某些反过来促进了该领域理论化的具体博物馆学实践。

一、新博物馆学与加拿大创新性博物馆类型的兴起（20世纪60—80年代）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博物馆学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国际交流，这种交流催生了人们对博物馆在当代社会中根本目的的深刻反思。这种对博物馆机构基础作用的激进质疑与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热潮相呼应，挑战了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

① 这次国际研讨会的众多创新之处及其显著优势在于，除了邀请博物馆学家参与外，还邀请了拉丁美洲的社会学家、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家，旨在通过开展深入且多学科的探讨，来思考如何使传统博物馆观念现代化，以及使实践更符合科学进步和现代世界不断变化的需求。因此，除了讨论博物馆的科学和技术发展之外，例如农村和农业经济中的文化发展、与环境相关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最后还有博物馆与终身教育等不太常见的主题，都是研讨会项目的关键议题。

② 除了来自巴黎的国际博协法国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外，参与者主要是拉丁美洲的博物馆学家、研究人员和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参见FERNÁNDEZ GUIDO H. Final report on the round tabl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role of museum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1973.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00/000027/002784eb.pdf>. Accessed March 22, 2021.

③ Fernández的报告中，“整合博物馆”被定义为一种“主题、藏品和展览相互关联，并与人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相互关联”的博物馆。

④ 有关MINOM的更多信息，请访问其网站 <http://www.minom-icon.net>. Accessed March 22, 2021.

⑤ 谢尔顿引用了戈麦斯·马丁内斯（Gómez Martínez）的观点，后者在2006年提到博物馆世界的两种运动——“盎格鲁-撒克逊”和“地中海”，以此解释“博物馆学制度化”的差异。



博物馆哲学和实践，并导致了新的博物馆学见解和实践的出现——即字面意义上的“新”博物馆学（‘nouvelle’ muséologie）。这个新词是由法国博物馆学家安德烈·德瓦雷在其1980年为《世界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中创造的。法国理论家弗朗索瓦·梅雷斯（François Mairesse）和安德烈·德瓦雷指出，该运动最重要的进展发生在1972年（智利圣地亚哥圆桌会议）至1985年间，当时诸如参与式博物馆学和文化认同等概念和理念在一系列新型博物馆中得到实践。这些新型博物馆在概念化的过程中共享着社区支持这一共同要素，并标志着博物馆与其服务的公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3]。几位加拿大博物馆学家参与了这些讨论，他们在推进这些理念和将相关实践具体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具体化体现在当时加拿大所发展出的独特博物馆类型。这些新博物馆类型的出现基于两种诉求：一是强调博物馆及相关机构在其所属社区中的社会和教育作用，二是通过致力于这些机构所服务人群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来实现这些机构的民主化^[4]。

新博物馆学运动所秉持的哲学不仅在于让博物馆更广泛地向公众开放，而且还期望它们能在社会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正如彼得·戴维斯（Peter Davis）指出的，新博物馆学源于“博物馆行业内部对博物馆的普遍沮丧，因为它们无法应对在战后面临的各种当代社会、文化、环境、政治和经济变革”^[5]⁶²。对博物馆基本作用的全新认识也源于新兴的遗产运动，以及世界范围内对保存、保护并将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传递给后代的必要性的认识，这与当时全球范围内的环境运动和后殖民理论同步发展。

这种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多次大会上探讨的“对博物馆理论和实践两方面

的彻底重估”，鼓励人们更多地关注民众的需求，从而“挑战了博物馆及其员工长期秉持的既定价值观”^[5]⁵⁹。《魁北克宣言》是1984年梅兰德及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遗产研究小组与新成立的魁北克生态博物馆协会联合举办的第一届生态博物馆与新博物馆学国际工作坊的关键成果。这份基础性的政策文件被戴维斯描述为“新博物馆学运动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5]¹⁸²，它肯定了该运动核心理念：社区博物馆学、社会进步、跨学科性、人道主义原则、社区发展和生态博物馆学^①。在首届工作坊和会议的基础上，随后又成立了更为正式的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组织。该组织是1985年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新博物馆学工作坊之后成立的。这使得该委员会获得了作为国际博物馆协会附属国际组织的重要地位（尽管并非它所期望的分委员会地位）。多年来，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组织定期在欧洲和北美举办会议，其理念也通过四语期刊《社会博物馆学论集》得到传播。

在实践中，新博物馆学的原则在生态博物馆这一新型博物馆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生态博物馆深受关于环境及其生态的更广泛认识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对遗产阐释和保护日益增长的承诺的影响。在加拿大，上博斯生态博物馆等生态博物馆均因地制宜，并深深植根于所在社区（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需求。在这些早期阶段，生态博物馆概念的确切定义尚未获得一致支持。梅兰德和雷内·瑞瓦德（René Rivard）对生态博物馆进行了广泛的理论阐述。1983年，梅兰德将生态博物馆描述为一个集合体，分布在一个群体的地域范围内，并擅长运用大众教育的方法。对他来说，生态博物馆建立在以下基础上：对生态系统——自然的和人类的——及其相互关系更加整体性的理解、跨学科性、公众参与以及一种保护精神。瑞瓦德进

① 梅兰德在此事件中的核心作用源于他1983年受邀为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组建一个关于生态博物馆和新博物馆学的工作组。尽管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未能按计划于1984年在加拿大召开会议，但已经做好了铺垫，因为《宣言》阐明了一项关键政策声明。该声明也发表在梅兰德1985年的论文《新博物馆学宣言》中。更详尽的叙述参见戴维斯《生态博物馆：地方感》（*Ecomuseums: A sense of place*, 2011），第63页。



一步将戴瓦兰（de Varine）给出的等式（地域+遗产+居民）加入了第四个元素——记忆^①。

加拿大最早的生态博物馆案例出现在魁北克，这凸显了法国和魁北克博物馆学家及理论家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一直延续至今。通过国际和法语网络的传播，这些基础理念推动了加拿大新博物馆学和生态博物馆运动的发展。然而，生态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理念在加拿大英语地区的发展遵循了不同的时间线和轨迹。加拿大英语地区虽然专注于遗产保护和管理，但并没有像魁北克的同行那样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么早、那么理想化地采用“生态博物馆”的术语。如今的生态博物馆在规模、范围和组织结构等方面都不同于先前的魁北克模式。其中几个博物馆巨大的地理范围有助于将多个遗址或更广泛的区域整合起来，以最大限度促进经济发展、文化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对地方遗产的社区治理。

二、“民主化和去中心化”： 加拿大的文化政策和国家名录计划的创建 （20世纪70—90年代）

实验性博物馆并非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唯一重要的博物馆学举措。新的联邦计划和政策的出台“促进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博物馆行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在更广泛的博物馆学和文化遗产领域引发了其他的理论探究。加拿大国务部长热拉尔·佩尔蒂埃（Gérard Pelletier）于1972年3月28日发表演讲，宣布联邦政府雄心勃勃的新博物馆政策，并特别强调了政府促进民主化和去中心化的两大主要目标。

早在佩尔蒂埃演讲之前，加拿大博物馆专业人员就已经认识到服务于广泛而多样化的民众所面临

的困难：

在一个像加拿大这样幅员辽阔且国情特殊的国家，任何联邦机构都面临着两种内在危险：一是它可能变得过于集中化，远离自发的“草根”活动；二是它可能过于紧密地与地方活动联系在一起，可能导致本已有限的精力和资源更加分散。在象牙塔斯库拉式的陷阱和联邦家长制卡律布狄斯式的困境之间，应当存在某种中间道路^②。

迈向文化民主化的第一步是了解加拿大博物馆的藏品情况^③。在政府管理下，追求民主化导致了“对（国家）藏品管理加强问责的……持续需求”^④。为此，新的国家博物馆政策明确规定创建国家名录计划。国家名录计划被构想为一个数字化数据库，其范围将在其运作的数十年间不断扩大^⑤。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名录计划是世界上第一个将计算机化引入博物馆并将其应用于藏品的广泛努力^{⑥⑦}。将众多博物馆中不同形式的信息收集起来，放入一个能为广袤国家服务的单一的、基础的数据库的努力被证明是困难但富有启发性的。

到1986年，国家名录计划将重点转向“与藏品管理相一致的国家咨询职能”，并更名为加拿大遗产信息网络^{⑧⑨}。从那时起，那些拥有计算机处理能力的加拿大博物馆开始独立工作，加拿大遗产信息网络开始为与文化遗产信息管理相关的产品、服务和培训提供咨询，这一角色延续至今。当今，将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藏品联系起来的努力也可以追溯到加拿大的国家名录计划^{⑩⑪⑫}。

加拿大创建数字国家名录的努力展现了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国家遗产的去中心化与民主化之间的张力。对文化遗产管理透明度的渴望合乎逻辑地促使人们将国家名录视为一种解决方案，即通过共

① 关于此主题的更多信息，参见RIVARD R. *Que le musée s'ouvre... ou Vers une nouvelle muséologie: les écomusées et les musées 'ouverts'* [M]. Quebec: Cultura. 2014: 94。关于不同理论家对该术语的不同定义，可参见戴维斯《生态博物馆：地方感》“生态博物馆：定义、理论模型和特征”一章中的细致分析。

② 1971年之前，有数个国际项目研究了如何使用计算机创建数字化的藏品档案。埃琳（Ellin）概述了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几个项目，参见Ellin E. *An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Museum Computer Activity* [J].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1968, 3(2): 65-86。



享文化遗产来团结一个广袤国家。然而，国家名录计划揭示了国家主导的去中心化和分散项目所面临的根本性挑战：为了创建一个能促进民主化访问的资源，首先必须将信息及其管理集中化。同样，集中化的数字记录也存在问题。为了使名录信息可访问而进行的数字化需要同质化和最小化。此外，一个中央机构决定了哪些文化遗产信息是重要的——除了预先设定的类别能容纳多少字符外，通常没有其他指导——以及哪些博物馆将首先成为数字化工作资金的受益者，这使得机构规模影响了可达性和可及性的理念。文化遗产的去中心化和民主化访问似乎是可取的，但却需要一个集中化的国家权威机构来实现。

加拿大遗产信息网络真正的成功之处在于使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加拿大的藏品，从而能够更广泛地参与重要的理论讨论。尽管一个全面的国家文化名录数据库尚未在任何地方完全实现，但加拿大遗产信息网络的早期努力继续启发和影响加拿大国内外的多机构数据库。

三、里程碑式展览与反身性转向 (20世纪80年代)

作为新博物馆学运动核心要义的社会理念在20世纪70年代末对加拿大博物馆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到了20世纪80年代，关于博物馆学理论的讨论则发展得更为细致入微。英国艺术史学家彼得·弗格在1989年出版的同名论文集中使用了“新博物馆学”(new museology)一词(令人惊讶的是，该文集未提及法国、加拿大或其他开创“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同行们的思想)。虽然弗格也呼吁“对博物馆在社会中的角色进行彻底的重新审视”，但他的关注点集中在博物馆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美学维度”上^[15]。该文集对博物馆领域的批判，已从多个学科(及跨学科)视角被广泛拓展。这最显著地体现在由一批国际理论家精心编辑的第二波论文集中，这些文集快速地相继追溯了这种奠基性的后现代转向^[16-18]。自此，新博物馆学让位于受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人类学、社会学、社会理论、

女性主义以及其中的跨界思想影响而产生的更新的称谓，批判、后批判和反身性博物馆学的概念在加拿大变得更加普遍。它们首先是作为理论话语^[19]，其次是作为藏品研究和展览实践中进行实践性实验(例如通过与社区合作)的理由。对此，杰西-佩德罗·劳伦特(Jesús-Pedro Lorente)的区分具有启发意义：

新博物馆学家主要是追随强力领导的行动主义者，批判博物馆学家主要大量存在于大学之中……“新博物馆学”起源于法语世界及其影响区域，“批判博物馆学”则是在后现代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发展起来的。在那里，人们特别关注博物馆表征什么和表征何人以及如何表征，指向了阶级、性别或多元文化主义等问题——也包括一些实践成果，例如将藏品归还给原住民^[20]。

反身性和批判性博物馆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其思想基础是后殖民实践和理论，这些实践和理论优先考虑多元性、社区协商和多元叙事而非主导叙事^[19]，并将其作为指导性的藏品研究策略，以弥补传统博物馆实践的疏漏，调整其呈现社会主流文化的偏好。它也质疑操作博物馆学或“实践博物馆学”的实践，以维持谢尔顿所称的“一种持续的批判性和辩证性对话，这种对话催生了对博物馆实践及其更广泛构成要素的不断的自我反思态度”^[2]。在其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加拿大学者和从业者自觉地参与多元文化主义、可见少数族裔群体的表征缺乏和身份政治、机构批判，以及面向多元公众的参与式博物馆学。社区协商、合作与多元性是近期展览的标志，这些方式不但是加拿大博物馆学理论的基础，而且是博物馆学实践中更加符合伦理且更具包容性的时代标志。

然而，若认为批判性、反身性博物馆学从理论构建到实践应用的转变在加拿大进展顺利，那就错了。1988年和1989年举办的两场具有开创性的展览既挑战了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博物馆学范式，也因其引发的争议和关注而成为促进地方和全球博物馆学实践深刻变革的典范。它们尽管并非未来实践的模范，但在无意间创造了“建设性对话的契



机”^{[21]6}，并成为重大政策变革的催化剂，为未来合作关系的发展，以及更符合伦理的合作实践铺平了道路——这些写作实践旨在呈现原住民和可见少数族裔的历史文化。

葛伦堡博物馆由人类学家朱莉娅·哈里森（Julia Harrison）策划的“灵魂之歌：加拿大第一民族的艺术传统”展，以及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由客座文化人类学家珍妮·坎尼佐（Jeanne Cannizzo）策划的“深入非洲腹地”展，都是“反身性博物馆学的早期实践”，并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这些展览所秉持的理念是如何被“对博物馆殖民遗产及其表征权力的批判所塑造的”^{[19]176}。坎尼佐的目的在于揭示“表征非洲的博物馆学和殖民实践，并……让观众了解加拿大和大英帝国的共谋关系”，同时她“探索帝国主义、收藏和西方展示传统”的策展意图^{[19]160-161}完全符合更广泛的权力关系视野中的反身性原则。然而，正如雪莱·露丝·巴特勒（Shelley Ruth Butler）所论证的，坎尼佐对后现代惯例的误用——在政治色彩浓厚的展示中模糊地使用文本反讽以及明显地缺乏语境，再加上没有与当地社区进行协商，最终导致了展览的失败。该机构因这次失败的展览而深受创伤，其于2016年秋季公开道歉。

在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争议之前，探讨欧洲殖民时期原住民文化的“灵魂之歌”展也曾招致谩骂。但争议原因并非如人们基于其他有问题的民族学展览所设想的那样在于其策展前提或内容^[22]，而是在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一家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在当时阿尔伯塔省的卢比孔湖克里族原住民社区的土地诉求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就赞助了该展览，以及对神圣和仪式物品的不当展示和当代原住民艺术的缺乏^[23]。壳牌公司对“灵魂之歌”展的

赞助促使克里族抵制该展览，并要求借展机构也这样做（许多机构确实抵制了）。该展览是与1988年卡尔加里冬季奥运会同期举办的艺术节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它也是葛伦堡博物馆民族学部门的一次协同努力，旨在通过这些遗产（暂时）从它们当时存放的主要国外收藏中带回来，以“教育加拿大人民了解他们国家的原住民遗产”^[22]。即使葛伦堡博物馆通过召集一个原住民联络委员会来回应争议，但这一举措力度太小，也太晚了。正如朱莉娅·哈里森当时所言：“博物馆过去（现在也是）致力于这样一种理念，即博物馆应独立于外部政治压力，以便能够决定自己的政治立场。”^[22]随着该领域质疑博物馆是否真正独立于外部政治压力，这一立场持续受到审视。

四、“翻开新的一页”：加拿大博物馆去殖民化的理论与实践（1992年至今）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加拿大政治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是原住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深刻转变^{[24]5}。在原住民政治行动主义和不断变化的原住民/定居者政治的推动下，这一重要转变也通过去殖民化的过程体现在加拿大的博物馆学与藏品研究实践中。菲利普斯将这一过程描述为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不断演变的争论、理论化、学科修正和实践的政治”^{[24]9}。在此之前，一些加拿大博物馆在其创始神话和对原住民社区的表征中采用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叙事^{[25]31}，延续了一种文化压迫形式，而联邦政府的同化政策——特别是贯穿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原住民寄宿学校时代^{[25]181}以及《印第安人法案》——已维系这种文化压迫长达一个多世纪^①。

① 《印第安人法案》是一部出台于1876年的广泛的联邦法规，它界定了加拿大政府与第一民族部落和保留地在诸如治理、土地、税收以及第一民族身份等议题上的关系。该法案制定的许多政策对第一民族具有歧视性和压迫性。然而，尽管面临挑战和争议，至今尚无替代立法出台。《印第安人法案》在经历多次修订和改革后（最近一次分别在1951年和1985年）仍然有效至今。参见<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article/indian-act>. Accessed March 22, 2021。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将原住民儿童强行从其家庭和社区带走，使他们同化于主流的欧洲-加拿大价值观，从而消除原住民文化。这些学校由加拿大政府设立，并由教会在19世纪直至20世纪90年代管理。参见https://indigenousfoundations.arts.ubc.ca/the_residential_school_system/. Accessed March 22, 2021。



菲利普斯认为,在1967年举办蒙特利尔国际博览会之际,由一个原住民咨询委员会策划的“加拿大印第安人馆”是一次对加拿大殖民博物馆学“早熟但革命性的”展示与批判,其同等水平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都难以企及^{[24]11}。她指出,这是“加拿大博物馆本土化进程开始的地方”^{[24]16}。在此过程中,包括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在内的某些加拿大机构在塑造批判性和去殖民化的博物馆学实践方面一直是先驱。

虽然加拿大国家博物馆中的主导性博物馆学话语在千禧年后经历了显著的修正与变革^①,但加拿大博物馆实践的去殖民化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一去殖民化进程的早期工作和重要时刻包括1967年世博会的印第安人馆、1978年全国原住民艺术大会的创建,以及1985年加拿大原住民艺术家学会的成立^[23]。“灵魂之歌”展被认为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分水岭^{[21]7}。1988年11月,第一民族议会和加拿大博物馆协会在渥太华联合举办了全国会议“保护我们的遗产:博物馆与第一民族之间的工作会议”。大会促成了一个工作组的建立,随后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全国深入协商,以确定该工作组的任务,即“制定一个伦理框架和策略,使原住民和文化机构能够共同努力,以表征原住民的历史和文化”^②。协商确立了理论基础,工作组提出了指导原则,这为进步的博物馆学实践提出建议。1992年发布的《翻开新的一页:在博物馆与第一民族之间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确认了如下原则:在阐释、研究、展览策划以及原住民文化遗产利用方面,第一民族应与博物馆专业人

员平等合作;迫切需要纠正由原始文化的民族学模式造成的普遍刻板印象,代之以当代文化中原住民的鲜活、动态形象;亟需为第一民族和非原住民博物馆工作人员提供培训,并使这些专业人员了解第一民族的价值观;在向来源社区归还非法获取的人类遗骸、圣物和文化遗产方面达成共识^③。该工作组不仅为加拿大实践的变革提供了基本的路线图,也为国外的从业者树立了榜样^{[24]13}。

如果说加拿大的博物馆在过去的25年时间里一直在完善工作组建议的基本原则,那么有些人则认为这些建议尚未完全实现^{[23]78}。原住民在加拿大整个文化领域表征不足的问题至今仍是加拿大人面临的难题。尽管在主流博物馆任命更多的原住民研究员担任要职、确保加拿大博物馆对原住民历史和文化的表征更具包容性和文化敏感性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全国的历史编纂学、博物馆、美术馆和历史遗址中仍迫切需要增加对加拿大第一民族成就的表征,同时加拿大主要博物馆在招聘原住民方面也需要更公平的做法。

尽管存在上述看法,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出现的大量显著举措有助于将原住民研究员的独特实践、原住民视角展示文化遗产的理论洞见带到博物馆世界。

五、结语:继续前进

本文对塑造20世纪下半叶加拿大博物馆学的一些认识论基础进行了阐述,并展示了两种博物馆学

-
- ① 重要的案例包括两家国家博物馆的大规模翻新:加拿大历史博物馆的加拿大历史展厅和加拿大国家美术馆新设的加拿大与原住民展厅。两者均于2017年加拿大建国150周年之际落成开放。
- ② Task Force Report 1994, Mission Statement, 1。同时期另一项重要的且关于加拿大艺术机构中原住民当代艺术地位的研究成果,发表于李-安·马丁(Lee-Ann Martin)1991年的报告《包容与排斥的政治:加拿大当代原住民艺术与公共艺术博物馆》。该报告面向视觉艺术界,是马丁于1989年在加拿大文明博物馆担任研究员期间撰写的,重点关注原住民进入艺术机构的途径、机构的政策与实践,以及该领域的排斥问题。
- ③ 虽然工作组报告的主旨是为第一民族与博物馆界之间建立合乎伦理且公平的伙伴关系提供指南,但在加拿大各地的文化机构中已经存在许多值得注意的合作——例如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安大略省布兰特福德的伍德兰文化中心、魁北克市的文明博物馆、西北地区耶洛奈夫的威尔士亲王北方遗产中心,以及阿尔伯塔省麦克劳德堡的碎头野牛跳崖阐释中心等。参见 Task Force Report 1994, 17-18。

流派如何各自在加拿大的英语区和法语区演变与共存。例如，新博物馆学运动的理念促成了生态博物馆学的早期实验，并于20世纪80年代催生出了一个新的博物馆学类型——社会博物馆；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争议性展览后，批判博物馆学在英语博物馆学文献中得到了更深入的理论化探索。

加拿大魁北克和原住民背景的众多从业者和学者在本国多元的理论视角与丰富的文化政治语境影响下开展的相关工作。这些工作一直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加拿大发展起来的充满活力且具创新性的博物馆学实践的核心所在。20世纪60年代本身也是全球博物馆学领域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关键节点。思想深刻的学者-从业者-行动主义者、跨国网络、新的文化政策、专业和学术培训项目的兴起和日益专业化等多种因素促进了这一发展。此外，加拿大特有的第一民族、定居者和更近期的离散社群的构成，及其不同的认识论取向也在定义加拿大博物馆学实践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卡梅隆曾大胆地突破博物馆学的先例，呼吁在当代公共生活中重新引入隐喻性的“论坛”。对于那些希望摒弃“神庙”传统、并通过探讨当代议题和辩论来彰显博物馆社会作用的机构而言，这是一种激进的替代方案。

随着我们想象和塑造博物馆及其实践隐喻的演变——从神庙到论坛，再到对话与合作的场域，我

们对一个更具伦理性和文化敏感性的机构及其实践的期望也在随之演变。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加拿大及国外博物馆变革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其明确转向“博物馆与社区的关系和合作”^[26]，那么展望未来，伊万·卡普（Ivan Karp）和科琳·克拉茨（Corinne Kratz）提出的“质疑型博物馆”概念则代表了从权威机构向更具对话性交流方式的转变。这个概念源于“一系列博物馆学过程，通过这些过程……（关于历史、身份、价值和地方的）陈述及（要求承认的）诉求得以表征、体现和辩论”^[27]。这对加拿大博物馆来说是个好兆头，因为它们正像邓肯·卡梅隆在20世纪60年代富有先见之明的设想那样，继续扩展其社会职责。从致力于通过提升公众参与、社区导向以及博物馆藏品和展览的可达性、民主化和分权化，来确保其社会相关性，发展到对其专业实践和公共成果进行去殖民化这一政治和道德要求，许多加拿大博物馆已经对全球博物馆学理论的主要观点和原则进行了实验、回应和拓展。为了使有意义的实践和机构转型沿着本文描绘的充满希望的道路继续下去，可能采取的形式包括博物馆、大学和（最广泛意义上的）社区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多学科和跨学科实验，以及对由此可能带来的偶然性和矛盾的开放态度。

参考文献

- [1] CAMERON D. The Museum, a temple or the forum[J]. Curator: The Museum Journal, 1971, 14(1): 12.
- [2] SHELTON A. Critical museology: a manifesto[J]. Museum Worlds: Advances in Research, 2013, 1: 7–23.
- [3] MAIRESSE F, DESVALLÉES A. Muséologie[M]//MAIRESSE F, DESVALLÉES A.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e muséologie. Paris: Armand Colin, 2011: 343–383.
- [4] RIVARD R. Que le musée s'ouvre... ou Vers une nouvelle muséologie: les écomusées et les musées 'ouverts'[Unpublished report]. Québec, 1984: 1.
- [5] DAVIS P. Ecomuseums: a sense of place [M]. London: Continuum, 2011.
- [6] NATIONAL GALLERY OF CANADA.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for the fiscal year 1954–55[R]. Ottawa: National Gallery of Canada, 1955.
- [7] SLEDGE J, COMSTOCK B. The Canadian heritage information network[M]//LIGHT R B, ROBERTS D A, STEWART J D. Museum documentation systems: development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Butterworths, 1986.
- [8] SPURGEON G. Managing change: from failure to success at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canada[J]. Museum International, 1994, 46(1): 12–19.



- [9] MUSÉES NATIONAUX DU CANADA. Rapport annuel[R]. Ottawa: Musées nationaux du Canada, 1979: 15.
- [10] MUSÉES NATIONAUX DU CANADA. Rapport annuel[R]. Ottawa: Musées nationaux du Canada, 1975: 7.
- [11] ALLEN S M. Nobody knows you're a dog (or library, or museum, or archive) on the internet: the convergence of three cultures[C]. Glasgow: The 68th IFLA Council and General Conference, 2002.
- [12] CARON D J. Memory institu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need for convergence and collaboration[C]. Banff, Alberta: Archives Society of Alberta Conference, 2010.
- [13] RAYWARD W B. Electronic information and the functional integration of libraries, museums and archives[M]//HIGGS E. History and electronic artefac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07–224.
- [14] TRANT J. Emerging convergence? thoughts on museums, archives, libraries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J].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009, 24(4): 369–386.
- [15] VERGO P. The new museology[M].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89: 2–3.
- [16] CARBONELL B M. Museum studies: an anthology of contexts[M]. Malden: Blackwell, 2004.
- [17] MACDONALD S. 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M]. Malden: Blackwell, 2006.
- [18] PREZIOSI D, FARAGO C. Grasping the world: the idea of the museum[M]. Aldershot: Ashgate, 2004.
- [19] BUTLER S R. Reflexive museology: lost and found[M]//WITCOMB A, MESSAGE K.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s of museum studies: museum theory. Chichester: John Wiley and Sons, 2015.
- [20] LORENTE J–P. The development of museum studies in universities: from technical training to critical museology[J].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012, 27(3): 237–252.
- [21] TASK FORCE ON MUSEUMS AND FIRST PEOPLES. Turning the page: forging new partnerships between museums and first peoples[R]. Ottawa: Assembly of First Nations and Canadian Museums Association, 1994.
- [22] HARRISON J D, TRIGGER B. “The Spirit Sings” and the future of anthropology[J]. Anthropology Today, 1988, 4(6): 6–10.
- [23] LOGAN J. It's not just noise[M]//MARTIN L A. Making a noise! Aboriginal perspectives on art, art history, critical writing and community. Banff, Alberta: Banff International Curatorial Institute, 2005.
- [24] PHILLIPS R B. Museum pieces: toward the indigenization of canadian museums[M].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1.
- [25] ONCIUL B. Museums, heritage and indigenous voice: decolonising engagement[M].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26] KARP I, KRATZ C A. The interrogative museum[M]//SILVERMAN R A. Museum as process: translating local and global knowledges. London: Routledge, 2015: 279–298.
- [27] KRATZ C A, KARP I. Introduction: museum frictions: public cultures/global transformations[M]//KARP I, KRATZ C A, SZWAJA L, et al. Museum frictions: public cultures/global transformation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31.